

文章编号: 1000- 0690(2002) 02- 0144- 06

历史时期官吏在海南开疆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朱¹, 薛德升², 曹小曙²

(1.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以海南岛开疆文化的发展为例, 探讨了历史时期各级官员在海南岛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指出我国历代的朝廷官员因为特殊的选拔机制, 从而较一般人更有能力在边疆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主要作用。文章最后指出, 现今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中, 从经济发达地区选派干部到西部挂职锻炼, 以及从经济落后地区选派优秀干部到经济发达地区挂职学习是新时期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开疆举措。

关 键 词: 朝廷官员; 开疆文化; 推动作用; 海南岛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识码:** A

开疆文化是指开发、开拓边疆的文化, 它包括了使边疆地区从落后的、不发达的境况下向较发达的、先进的阶段转变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文化层次中的各种要素^[1-2]。海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就其本质而言, 是各时期中央政府着力开拓、大陆主体文化不断传播渗透并渐次影响的结果,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开疆文化。而开疆文化在历史时期海南岛的传播扩散, 如果说其影响的扩大、深入和巩固得益于众多移民的到来和岛内外假借商贸等各种形式的交流的话, 那么, 历代各级赴任海南官员的勤力开拓和积极播扬中原汉文化则是这种过程极其重要的部分。在海南岛全面的发展历程中, 众多官员以及一些名人和英雄式人物在本岛历史的创造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角色, 他们对海南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1 历史时期官员的文化意义

自隋朝以来的开科考试造就的各级官员多具有深厚的经学、文学功底和较高的文化素养, 以及对国家大政、治国治民方略的敏锐观察力与独到见解^[3], 因而, 我国历代的朝廷官员, 大多较一般人更有能力在边疆文化发展中发挥更主要作用。

远在周朝时, 我国大小官职多是世代相承的, 所谓的“世卿世禄”制度就是当时官吏选拔的主要

手段, 甚至还出现不少以官职为氏号的家族。“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 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虽然东汉时也推行过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 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 经过考核任以官职的“察举”和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的“征辟”这样选拔官吏的制度, 但“以族(门第)举德, 以位(权位)命贤”, 仍旧是那时司空见惯之现象。“选士而论族性阀阅”成为官吏选拔的实际写照。直至隋代科举制度开始, 才使九品中正制度得以废除。科举制度总体来说, 无疑有利于人才选拔, 使德才兼备的人士进入到各级官员行列, 从而有利于统治者提高政治效率。此种制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形成一种促进机制, 迫使成就官员者非得饱读四书五经圣贤书不可, 这自然就从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各级官吏的文化素养, 有助于使他们拥有比一般人更高或更多的知识积累和技术、思想等素养。而前者那种世袭制虽然有其腐朽、堕落的一面, 但相比来说, 名门望族人家由于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一般也较平常人家更偏重于子女教育, 加之种种耳闻目染的环境熏陶, 可以说, 在当时制度下进入官吏层面的, 相比于一般的老百姓, 不少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和更多的知识储备。所以, 从以上两方面来说, 历朝各级官员中的大多数一般都是具备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全面的技能, 思想、管理水平也较高的一个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 以及

收稿日期: 2001- 01- 28; 修订日期: 2001- 08- 11

基金项目: 中山大学后备重点基金及青年教师启动基金课题(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朱 (1968-), 男, 甘肃临夏人, 博士,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文化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和教学。E-mail: eeszh@zsu.edu.cn

他们自身所肩负的“父母官”的使命感,使他们更有条件、基础在开疆文化传播中担当重任。实际上,历史时期的诸多朝廷命官在边远地区的执政过程中,除了本身的管理职能外,还充当着文化播扬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2 历史期海南开疆文化发展中官员的作用

2.1 海南文化的性质界定

海南岛偏处祖国边陲,历来被人视为畏途。海南的开发浸润着各族人民的汗水。海南文化可以说是在早期传入的黎族文化本底基础上,经历史时期汉文化及苗、壮、回等民族文化,以及近现代以来的华侨文化和农垦文化、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先后以不同的传播类型、传播方式长期开拓影响,并经相互碰撞融合、推陈出新,在海南这一地域环境下整合生成的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所以,从本质讲海南文化是一种开疆文化,换言之,它也是一种开疆文化长期传播影响的结果。其中既有汉黎苗回壮等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也有名家流寓人物对发展海南文化所做的贡献。在海南开疆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历代朝廷命官尤其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2.2 历史期海南的文化成就及官员情况

海南岛从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经过朝廷贬官及各级官员的促进,从唐首举兴办教育,并经宋代由地方官办教育,从宋代至清代,人口稀少的海南岛登进士第者计有 95 名,中举人者 785 名。至明清两代,海南中科举者大幅度增加,终明一代的 89 科殿试之 39 科中就有海南 62 名考取进士,清代 114 科进士考试,其中 28 科海南有 31 人榜上有名。明清两代海南共 93 名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 51 624 人的 0.17%,平均每县(州)约 7 人,而琼山一县多达 51 人^[4]。这一成就虽然与全国文化发达地区相比尚微不足道,但同各边远地区相比,可称得上是蔚蔚可观了。一个地区内人才集团的出现是以教育为前提的,而教育的成功与否却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经济的发达程度往往是与教育、人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所以,从宋代开始的海南人才渐盛现象说明,海南社会的整体进步水平也在逐步改善和提高,而这一切无疑与历朝过琼贤士贵

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据王俞春对历代贬流来琼和过琼任职的 500 多名官吏籍贯的统计^[5],涉及现在全国的 24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福建 75 人,广东 56 人,江西 44 人,浙江 43 人,江苏、广西各 39 人,河南 21 人,安徽 19 人,陕西 14 人,山东 13 人,四川 12 人,湖北 11 人,山西、河北各 9 人,湖南、北京、上海、内蒙、天津、辽宁、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也各有数名。虽然,所统计人员纵贯古今,但从他们来源地的大分散、小集中状况分析,多来自于历史期文化最发达的江浙、江西、福建等地方。故而今日兴盛的海南文化中也凝聚着国内各地不同地域文化的质素,特别是那些文化中心地区。不同类型的文化借助于这些名宦重臣,通过多种形式的移入,终形就了如今多元、丰富的海南文化胜景。

2.3 海南开疆文化发展中贬官谪臣的作用

历代封建中央政权派系斗争激烈,致使素有“蛮荒之域”、“瘴疠之区”之称的海南岛成为流放贬谪官员的理想之地。综观海南岛贬官谪臣之历史,唐代贬谪海南的各级官吏共有 22 人,宋代流配到海南的名宦贤士则有 27 人。唐宋两朝,有王义芳、韩瑗、韦执谊、李德裕、苏轼、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名士高官因种种原因被流放到海南岛。而元朝更是承袭前朝之策,继续把海南作为主要的流放之所,有亲王图帖穆尔、参知政事王仕熙、侍御史丘士杰、诸王忽刺等名宦重臣被贬海南岛^[6]。虽然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海南的发展和汉文化在海南的传播得益于各朝代不断迁入的大量移民。但是,个人的历史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些被贬来琼的大多是当朝重臣,许多本身就是名扬全国、学富五车的名士大家和文坛巨臂,他们来到海南之后,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并热心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7]。可以说流寓人物在海南开疆文化的发展中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如海南首位贬臣王义芳于贞观末年(638 年)被贬到儋州吉安(现昌江县)后,为了传扬中原文明,针对“吉安介蛮夷,梗悍不驯”的情况,“召首领,预选生徒,为开陈陈书,行释奠礼”^①。唐李德裕等人在当地更是“教民读书著文”,或“讲学明道,教化日兴”。李本人虽身处逆境,仍不忘著述,在海南有 49 篇诗文遗世,也为海南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① 《新唐书》卷 112,《列传 37·王义芳》。

胡铨在崖州时,“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闻之,遣子入学”,促进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北宋时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及当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苏东坡流放儋州三年,关心黎族人民的生产,开辟儋州学府,自编经义,自讲诗书,大力传播文化,发展教育,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人才。其弟子姜唐佐于北宋崇宁二年(1102年)就成为海南有史以来“破天荒”的首位举人。到大观三年(1109年)符确义第一个考中进士。宋代海南共出了12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化光芒,不能不说与诸多来到海南的朝廷贬官和流寓名士不无关系。

众多贬官谪臣除了热心教育事业、致力于移风易俗之外,还主动教授有关的生产生活技术。如唐顺宗时的年轻宰相,一代文豪韦执谊于唐宪宗时(805年)遭朋党排挤,被贬来崖州(今琼山),他在积极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还指导南渡江中游人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深得当地人民爱戴^[8]。另如丁谓,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在“户口都无二百家,……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①的崖州(今海南崖城)“教人读书为文,营造屋宇;……其所著诗文亦数万言”^②。既便是在文化发展处几近停滞状态的元代,也因大批封建官吏贬谪海南,促进了中原文物衣冠的流入。如文宗(图帖睦尔)在流谪海南的三年间(至治元年(1321年)~泰定元年(1324年))修建佛塔,对海南的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元代王仕熙以其大量有关汉黎人民生活 and 海南胜景的名篇佳作对海南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9]。还须提及的是,尽管有明一代,海南文化已有显著改善提高,但也有不多的几位官吏被贬至海南。不管是其声名、居琼时的政绩,还是当时的社会影响都较为有限,所以一般均少提及。但作为开疆文化中之一分子,也不容忽视。如元进士、济南人李恩迪“洪武四年,谪宰琼山。学博才杰,廉明勤恪。……革奸贪,毁淫祠,弊极事繁,办理无虚日”^③,还有赵谦、杜宥、孙岳为、薛祥等人。总之,贬来琼岛的众多官吏,以他们的个人魅力和文化素养,以及对开发海南的热情和不懈努力,使海南教

育、农业生产、社会文明程度等得到全方位的提高。

历代贬官流臣因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和独具的个人魅力,以及其特殊的背景和社会地位,加之较高的个人素养和身为地方父母官所具备的天职,以及所具备的行为惯性,使他们对教育、地方发展等格外地关注和重视,哪怕个人在政治上受到多大的挫折,但他们在被贬之地却并未消沉。所以,综览海南开发历程,他们的功德当彪炳千史。

2.4 历史时期各级官员对海南开疆文化发展的促进

早在东汉明帝十八年(75年),僮伊擢为交州刺史时还至珠崖,当时就致力于“戒敕官吏毋贪珍赂,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习,自是日变”^④。不仅劝戒官吏廉洁自律,而且还广泛提倡改变陋俗遗风,取得了明显效果。而东汉锡光为交趾太守时,“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⑤,锡光所为,其意义更深更广。不仅教授耕作之法、草除不文明的习俗,而且创建学校,开始传经授义,其远见卓识真正让后人望其项背。因东汉时海南为交州属地,锡光的治策当影响到此地。

有唐一代,海南诸官员的开疆之举涉及面则更加全面广泛。唐政府对琼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有些官员还主动参与当地部落间争斗的调停,为海南的平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如贞元间收复琼州后,李复“使令降人权立城厢,开剪荆榛,建立城栅”^⑥,筑城建寨以形成初期的政治、经济的统治中心,不能不说播扬汉文化已取得了相当成就。

宋代张歧以秘书丞知琼州,“琼俗悍朴,其地多飓风,能拔屋,盛夏犹寒,张歧教以立屋之法,稍免其患”^⑦。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知琼州宋守之“教诸生读五经于先圣庙,置学田资膏火,由时州人始知好学”^⑦。绍圣间(1094~1097)进士古革则“教授琼州,训士不倦,峒蛮多遣子弟受学”。甚至“会黎人叛,郡檄入峒布谕,蛮俗素知敬革,遂率服”^⑧。此外,南宋淳熙九年(1182)琼管帅韩壁

① 《舆地纪胜》卷127。

② 《正德琼台志》卷28。

③ 黄佐,《广东通志》。

④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卷53。

⑤ 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四》卷234。

⑥ 明谊,《琼州府志》卷22。

⑦ 郝玉麟,《广东通志》卷23。

⑧ 黄佐,《广东通志》。

“出入阡陌, 劳来不倦, 期年化成, 黎人感慕, 愿供田税”^①, 取得了黎人自愿入籍归顺的效果。而宁宗庆元(1195~1200)初, 琼州通判刘汉“修崇郡学, 讲明道义, 诸劝生徒, 创建社学, 延师训导, 捐贤廩给, 黎獠犷悍, 亦知遣子就学, 衣裳佩服踵至者十余人”^③。

从上述有关史料反映的信息可以清楚地推知, 各级官员始终将“抚辑黎峒, 教以诗书”, 以及“设学讲义”视为己任, 传业授惑已从最初的革除旧俗、教授耕作之法到全面、系统地文化传输。这一过程在宋以后的各朝中应该说是继续得到加强和广大。

元代官吏中也出现了不少致力于兴农、劝学, 广扬中原先进文化之士。如至元间马成龙, 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时, “修庠序以劝学, 政化大行”^②, 范椈在任海北海南道廉访司照磨期间, “巡历遐僻, 不憚风波瘴疠, 所至兴学教民”^③, 此外, 范椈以诗文著称于世, 以大量的遗作有功于海南文风之兴; 吕铤在天历二年(1329年)为海北海南道廉访金事时, 亦“修筑城池, 兴学校, 厚风俗, 尝按部于琼, 以宣化敦俗为先务, 有惠政于民”^④之举。还在黎区广建“寨学”, 据清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八》卷二“防黎”条载: 至元间阔里吉思平黎后, “从省幕乌古孙泽仪, 立寨学训谕诸峒”, 用以专门教育黎族子弟, 无疑对发展黎区教育有重要历史意义。

明清以降, 各级官员的作用则更为显著, 并显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人数甚众, 二是普遍主动投身于播扬先进文明之行动。一方面他们积极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如洪武二年(1369年)董俊知昌化县, “勤课农桑, ……黎民咸乐其业”。明末, 钟麟郊知感恩县时, “劝农务本, 招集流亡”^⑤。这在农业尚不十分发达的海南岛, 劝课农桑是当然的治琼政策之本; 另一方面, 他们还鼎力倡导兴修水利, 并言传身教, 发挥了带头示范作用。如正统间, 昌化知县“本县田地浮沙薄土, 苦于干旱, 于是教民筑堤蓄水, 引以灌田, 自是无抗旱之患, 民甚便之”^⑥; 嘉靖时, 林資深知崖州时“相

地浚沟, 引南北水合注平壤, 溉数千顷”^⑦, 同期的乐会县韦相邦更是有“筑堤灌田, 民受其利”^⑧之举。又据清周广等辑《广东考古辑要·堤堰》卷九载, 明代地方当局修建的较为著名的水利工程有: 崖州东北的都陂、西南的抱架沟、东南的高村陂, 昌化县南的崔公河等处。总之, 明代海南农业文化逐步发达, 农业产量明显提高与兴修水利分不开, 而水利设施的修建又是各地方官员重视努力的结果。

除此之外, 明朝职官在兴文教方面亦大有贡献, 并多以办学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根据方志记载, 洪武间宋希颜首任琼州知州和知府时, 就“建学宫, 规模宏远”, 各县知县也视“兴学校”为己任; 成化九年(1473年), 罗杰守儋州时, “兴学校, 振士风, 儋州民风文物丕变”; 有些官吏还重视各级人才的举荐, 如崖州徐琦(成化中)“选民间子弟俊秀者教之读书, 俾知礼义”; 亦有地方官员捐资修学, 用以促进地方文化发展。如嘉靖间徐希朱置崖州事, “捐修学校, 造就多士, 文风赖以振兴”等等。有明一代, 海南地区的府、州、县学以及书院、社学得到全面发展, 造就了本地一批又一批人才, 加之徐琦这样的官员“教以婚丧礼, 在崖九年(正德间), 俗为之变”^⑨, 重视在当地积极推行汉族婚丧礼制及习俗, 使海南民风文物发生了显著变化, 迅速缩短、甚至消除了与内地的文化差距。

清代官员对海南开发的主要贡献亦不出“劝农”、“兴学”, 可能在一些具体的办法上与前朝稍有不同。如道光《广东通志·宦绩录三十》卷二六零中所载康熙二十三年的昌化县令陶元淳“度隙地、立墟市, 招流亡, 劝开垦, 予以牛谷不起征”^⑩, 通过适当的促农措施, 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值得强调的是: 一是出现了不扰黎, 并平等待黎的现象, 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 孟毓蕃任乐令知县时, “时值黎乱, 弁兵往来, 毓蕃经画有条, 民不得有扰。黎有诬冤屈者六年, 毓蕃极力保全, 黎人感泣”^⑪。从中反映出地方官努力创造民族平等之氛围, 其行自会带动民族间和睦共处, 并对社会、经济

① 刘耀奎(编).《黎族历史纪年辑要》,第24页,广东民族研究所,1982年。

② 元·程钜夫.《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马府君神道碑》,载《雪楼集碑铭》卷20。

③ 《元史·范椈传》卷181。

④ 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十一》卷241。

⑤ 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十一》卷30、253。

⑥ 《正德琼台志·宦绩》。

⑦ 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二十三》卷251。

⑧ 明诰.《琼州府志·宦绩》卷30。

⑨ 清·周广.《广东考古辑要·名宦》卷37。

⑩ 明诰.《琼州府志·宦绩》卷31。

⑪ 黄佐.《广东通志》。

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二是清末张之洞、冯子材等人的“抚黎”政策,其目的虽在平黎、抚黎,但他们在琼期间,使“五指山十字大路”之计划有系统地开始付诸实施。其开路之举,以及随道路通畅之后而产生的沟通与外界联系之加强,打破黎区封闭原始之状况等带来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巨变,则理所当然地成为流芳百世的开拓盛举。相信在

设学校、开科举,推行同化政策等措施的配合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根据历代各朝海南官吏中部分地方官员的表现,可以断言,海南岛的开拓发展中也凝聚着诸多为其繁盛而付出努力的历代官员的心血和汗水。笔者统计了定安、文昌等县历朝官吏的籍贯状况。

以上四表虽则所列仅是三县有关的职官籍贯,

表 1 定安县清朝知县籍贯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birthplace of the head of Dingan County in Qing Dynasty

籍贯	江苏	河北	陕西	浙江	福建	湖广	河南	山西	贵州	广西	安徽	辽宁	湖北	旗人	江西	四川
人数	8	9	8	6	6	5	5	4	4	4	3	2	2	2	1	1

资料来源:光绪四年《定安县志》。

表 2 定安县清朝巡检籍贯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birthplace of the inspector of Dingan County in Qing Dynasty

籍贯	江苏	河北	陕西	浙江	福建	湖广	河南	山西	安徽	甘肃	北京
人数	4	4	1	13	4	3	1	1	3	1	4

资料来源:光绪四年《定安县志》。

表 3 临高县清朝历届知县籍贯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birthplace of the head of Lingao County in Qing Dynasty

籍贯	浙江	湖广	福建	江南	直隶	河南	江西	云南	广西	四川	山西	辽宁	贵州	陕西	顺天	不明
人数	10	8	8	8	6	4	4	3	3	3	2	2	2	1	1	10

资料来源:光绪·张公廷重修《临高县志》。

表 4 明清文昌县职官籍贯分布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birthplace of officials of Wenchang Coun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籍贯	江西	浙江	福建	广西	湖广	江南	云南	陕西	四川	贵州	山西	山东	直隶	全州	蒙古	旗人
人数	18	14	12	15	7	9	4	4	4	1	3	2	2	1	1	4

资料来源:康熙《文昌县志》。

且主要是明清以来的情况,但也从其中反映出足够的信息。即海南的官吏主要来源地集中于福建、浙江、江西、江南,以及直隶等地,而这些地方则多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地区。其地域文化的烙印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各级官吏的影响波及到海南。与王昶春编著的《历代过琼公传》中 500 多位过琼的历代当政者籍贯统计的情况与笔者的统计所反应的情况几近雷同,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文化中心地区往往培育出更多的人才,并有机会担任各级官吏,而这些带有其出生地优势文化印迹的人,必以其背景强势文化为依托,将各种文化因素通过适当途径播扬到他所担当重任的地方,从而对当地起到开拓、带动作用。因此,对历代府、州(郡、军)县的主要官位多为大陆人担任的海南岛,这种过程也成

为其开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部分。

3 结束语

总之,历史时期各级官员以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带动作用,通过教育的普及、先进文化的传播(包括农业技术、建筑技艺、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在海南开疆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明邱浚在《邱文庄公集》中说到的“今则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国,而与四方髦士相先后矣”的缘故,以及通过诸多贤士“劝学已知崇礼教,……雅意诸贤指示多”,故而“土风犹是传邹鲁”的必然结果。

综观现实的强国富民措施,派遣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官员到经济落后地区挂职锻炼,其功效

其实无异于历史期的官员所发挥到的开疆作用。这些官员往往会以更加开拓的作风、更加超前的意识和所具有的优势文化影响落后地区, 并以他们独到的管理经验和市场意识带动所挂职地区的全面发展, 包括文化的进步。当然, 与此同时, 在建设现代化强国过程中,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广大落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快速、稳步发展, 国家还积极从落后地区选取各级领导干部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挂职学习, 以期通过他们切身的感受和学习提高, 汲取发达地方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兴盛等方面的先进作法和管理经验, 以及信息、技术, 并通过某种协作关系的建立, 为项目、资金的引进铺就道路。可以说, 这种方法较之历史时期所惯用的方式, 应该说其带动、促进作用更直接、迅捷, 也更来得显著。许多边疆地区的发展事实就充分说明, 那些掌握了较先进管理经验、灌输了较开明观念、拥有了更多有益于地区发展的手段、方法的来自落后地区的干部, 从发达地区学习返乡后,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根据所在地方的实际情况, 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 扭转了地方状况, 促进了地区的全面发展。因此, 如上两种办法, 也正是现今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既派遣高素质和具备现代高科技知识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干部队伍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工作, 通过他们的亲身

推动作用, 将先进的文化技术和超前的发展战略, 以及丰富的市场经验传播到西部, 进而起到新时期的开疆作用, 加快西部地区从文化到经济的全面建设步伐。同时, 也积极创造条件, 为落后地区的干部到发达地区学习、“借经取宝”提供便利, 通过这种互动的方法, 推进我国广大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感谢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中心司徒尚纪教授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朱 , 司徒尚纪. 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地域扩散与整合研究 [J]. 地理学报, 2001, 56(1): 99~ 106.
[2] 朱 . 从地名看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 [J]. 地理科学, 2001, 21(1): 89~ 93.
[3] 韩茂莉, 胡兆量. 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 [J]. 地理学报, 1998, 53(6): 528~ 536.
[4] 陈纯殷. 古代海南岛移民史略 [J]. 海南史志, 1994, (1): 17~ 22
[5] 王君伟, 历代海南进士简介 [J]. 海南史志. 1991, (2): 32~ 36.
[6] 王俞春. 历代过琼公传 [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2. X~ XI.
[7] 朱逸辉. 略论海南文化之发展 [J]. 海南史志, 1994, (3): 1~ 9.
[8] 林英. 海南岛人文史观 [J]. 海南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91, (3): 1~ 8.
[9] 吴永章. 黎族史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24, 188, 253.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Progress of Hainan Developing Frontier Culture

ZHU Hong¹, XUE De-sheng², CAO Xiao-shu², SIU Shang-ji²

(1.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2.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progress of Hainan culture development in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concept of frontier culture and its forming, which points out that in the history, the officials always much more can give pl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 frontier, because of their better culture background. In the history of Hainan Island, the official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Hainan’s cultural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officials were sent to the west of China from the developed areas(such as the coastal areas), and the officials were sent to the developed areas from the west of China may be considered as effective measures of developing frontier culture in new century.

Key words: Officials of government; Function of Development; Developing frontier culture; Hainan Island